



鲁迅作品选讲

(5)

北京人民出版社

鲁迅作品选讲

5

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教学小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鲁迅作品选讲

5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32,000 字

1974 年 3 月第 1 版 197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00

书号：10071·99 定价：0.14 元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两面派，看得清，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曾经致敌人于死命，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由于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7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①

一 来 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 Reds 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 Reds 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

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 Reds 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〇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健康！

陈×× 六月三日。

二 回 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②的《斗争》《火花》③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④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⑤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⑥，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

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⑦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⑧，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
大安。

鲁 迅。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同时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的《文学丛报》第四期和《现实文学》第一期。周扬、夏衍一伙的《光明》、《文学界》拒绝刊登。鲁迅逝世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来信的“陈××”，原署名“陈仲山”。

托洛斯基（通译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列宁主义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国际性的反革命匪帮。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结合，于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胡说国民党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长期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将来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由于他们实际上是要取消中国革命，所以他们被称为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简称托陈取消派。他们公开参加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又接受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反共卖国活动。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化名“陈仲山”写给鲁迅的信，正是他们反共卖国活动的一种表

现。

② 惠，恩惠，常用来作副词表示对别人的尊敬或感谢。这里鲁迅是说反话。

③ 《斗争》、《火花》，均系托派刊物。

④ 史太林，通译斯大林。

⑤ 托洛斯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苏联托洛茨基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在国外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一九四〇年死于墨西哥。十月革命前，他曾被沙皇政府流放到西伯利亚，本篇所说的“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即指此事。

⑥ 逐，驱逐；飘泊，流浪；潦（liǎo）倒，颓丧，不得志。

⑦ “战友”，即周扬一伙，他们曾恶毒诬蔑鲁迅是“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等等。

⑧ 指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⑨ O. V.，即冯雪峰。

讲 解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伟大

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一生战斗精神和高贵品质的光辉写照。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则是这种精神和品质的生动体现。鲁迅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鲜明而强烈的爱憎以及洞察一切的政治远见，渗透和洋溢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虽然三十余年的岁月已经过去，但这封不朽的信件仍是我们批林整风，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能力的好教材。

托洛茨基匪徒在信中摆出一副极“左”的姿态，恶毒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恶毒攻击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他们把中国工农红军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军事投机”，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诬蔑为“背叛”革命，满纸都是什么“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无耻”之类的恶言秽语。他们恬不知耻地丑表功，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大肆贩卖他们的那一套取消主义观点，妄图以假乱真，进行欺骗。但是，他们的这种捶胸顿足、指天发誓的丑恶表演，他们的托派真面目，鲁迅一眼就看穿了。鲁迅以愤怒的语言，对他们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鲁迅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

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托派匪帮的伪装，指出了他们乃是“拿日本人钱出报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一小撮汉奸卖国贼。

正象鲁迅经常说的那样：“能憎才能爱！”（《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对托派所以能这样斩钉截铁、大义凛然，关键是由于他对列宁、斯大林艰辛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衷的热爱；是由于他对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鲁迅以自己一生的战斗经验和无数先烈的血的教训，认识到“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认识到列宁、斯大林艰辛缔造的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认识到以毛主席为光荣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等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他们是“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代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而自己“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对于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是竭诚拥护的。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

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而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这就是他革命的无比坚定性，是他能以怒斥托派谰言和热烈歌颂革命领袖、革命政党、革命事业的原因。

当然，鲁迅能那样及时地识破托派的真面目，也是和他丰富的斗争经验、敏锐的政治嗅觉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人们“防被欺。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而已集·小杂感》）。即使某些“道德家”“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他还教导人们：“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他一生最厌恶的就是那些骨子里极右、口头上极“左”的口头革命家。因此，尽管在收到来信的当时，托派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尚未

充分暴露，但鲁迅却已经用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照出了他们的丑恶嘴脸，透过他们故作激烈、自我标榜的革命词句，看出了他们的卑鄙意图和险恶用心，并给以致命的一击，使他们“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鲁迅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这个显微镜和望远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了它，任何伪装都可以识破，任何诡计都可以戳穿，任何貌似正经的反革命两面派都可以让他无可逃遁地现出原形。

正由于鲁迅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远大的政治眼光，对于托派对他的包藏祸心的吹捧才能坚决抵制，丝毫不为所动。鲁迅的一生，听惯了洋奴买办、帮闲走狗以及周扬一伙反革命两面派的恶毒咒骂，但也碰到过不少虚伪的恭维和吹捧。对于前者，他认为自己的“一种幸福”，他说：“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是敌人。”（《南腔北调集·给文学社信》）对于这些家伙，鲁迅高度“蔑视他们，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对于后者，他则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看透了某些人物对他的“捧”只不过是“骂”的别一种形式的继续。他说，中国历来就是“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

的手段”，“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而他自己则“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時候，又被人摔下来”（《华盖集·我的“籍”和“系”》、《华盖集·这个与那个》）。在他看来，凡是自己的同志，“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华盖集·通讯》）鲁迅在这里虽然谈的是他个人的体验，但实际上概括的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骂”与“捧”，是一切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两面派惯用的伎俩，根据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他们交互地使用这两种手段。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在这方面就做了充分的表演。因此，鲁迅斥“骂”防“捧”的原则立场和清醒头脑，鲁迅对托洛茨基匪徒们的愤怒斥责，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二

托派匪徒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初旬给鲁迅写信，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三十年代前期，如毛主席所说，正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在文化战线上，以鲁迅为英勇旗手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在极端险

恶的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但是，暗藏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伙却疯狂推行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把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鲁迅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或明枪，或暗箭，或造谣，或诬蔑，施展种种卑鄙手段，对鲁迅大肆围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早在一九三三年初，周扬就暗中唆使党羽首甲等四人，恶毒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采”。到了一九三四年，这种攻击便日甚一日地加剧起来。七月三日，周扬的干将、叛徒廖沫沙化名林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晚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有“买办意识”；八月底，“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又化名绍伯，同样在《大晚报》副刊上大骂鲁迅是“调和”派，说他替叛徒杨邨人“打开场锣鼓”；他们甚至还背着鲁迅，秘密编印了左联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在上面大骂鲁迅。到了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由于鲁迅不同意他们解散“左联”，不加入他们的“作家协会”（后改名“文艺家协会”），不同意他们“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他们对鲁迅的围攻就更是变本加厉，什么“破坏统一战线”、“左的宗派主义”、“托派”、“汉奸”等帽子，一个接一个地飞来。正是在